

译者行为研究

中国当代非虚构文学书名英译的译者行为批评

高晓仙^{1,2} 赵国月²

(1. 四川外国语大学 翻译学院, 重庆 400031; 2. 长江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 重庆 涪陵 408100)

摘要:中国当代非虚构文学在英语世界的接受效果并不理想,特别是国内出版社主导的译出作品的传播效果不佳。英语世界出版社主导的译入作品书名英译优先从翻译内寻找对策,而国内出版社主导下的译出作品书名英译优先从翻译外寻找对策。如此,译入作品书名英译的忠实度高于译出作品,译者行为倾向于语言性求真和社会性务实,译出作品书名英译的译者行为则倾向于社会性务实和社会化务实。然而,从接受效果看出,是否忠实英译书名并不是决定中国当代非虚构文学英译被接受的关键,而真正的决定性因素是翻译方向和题材选择。因此,要想使译出的中国当代非虚构文学走进英语世界,向目标语读者塑造符合自我期待的中国形象,应从成功译入英语世界的作品选题与译者行为模式中寻找经验与对策。

关键词:中国当代非虚构文学;书名;译者行为;译出;译入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6)04-0147-12

DOI:10.26922/j.cnki.waiguoyuwen.2026.04.012

0 引言

面对当前中国文学“走出去”但不能“走进去”的困境,学界争相讨论,寻找症结,探索良方,如郑晔(2021:172)在研究《中国文学》的失败原因时指出:“国家垄断翻译文学的译介并不可取。”谢天振(2014:8)则认为:“一般情况下,文化总是由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译介,且总由弱势文化语境里的译者主动把强势文化译入自己的文化语境。”然而,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和世界语境中,中国文学“走出去”并“走进去”的艰巨任务要完全依赖于国外译者并不现实。在两者都能兼顾的基础上,可行性较大的出路是肩负中国文学译出行为的中国译者从成功的中国文学英译活动中吸取有效的经验,优化译出行为模式。“中国学者需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重点项目“中国当代非虚构文学英译批评研究”(2025NDZD16)、重庆市教育人文社会科目项目“‘凯迪克’儿童绘本汉译与传播研究”(23SKKGH337)和重庆市外语教育教学改革专项项目“基于‘大语言模式’的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高晓仙,女,四川外国语大学翻译学院博士研究生,长江师范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儿童文学翻译、绘本翻译与翻译教学研究;

赵国月,男,长江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文学翻译与翻译批评研究。

引用格式:高晓仙,赵国月.中国当代非虚构文学书名英译的译者行为批评[J].外国语文,2026(4):147-158.



本刊微信公众号

要熟悉当今世界的现实与发展趋势,怀着文化自信深入研究西方文化,在‘我为主’的当代文学译介基础之上,探索中国形象‘本土自构’的翻译之路。”(陈保红等,2023:91)

战略上清楚了中国文学“走出去”应“师夷长技以制夷”,战术上应该从何入手?译者作为跨文化交际两端的中间桥梁,其行为模式或许是该议题的另一突破口。本文尝试从书名翻译切入探讨该议题。“虽然文学作品的标题一般只是一个或几个词的组合,但它是作品全部内容的高度浓缩,往往具有内扩外延、引发联想的强大功能”(虞建华,2008:68),透过标题可以洞悉全书内容,撷取全书思想,供读者抉择阅读与否。书名翻译“关系到异文化读者对著作内容的理解以及著作在异文化中的传播效果”(黄剑,2021:133)。作为“以写实为主,对事件真相进行全面还原”的“非虚构文学”(赵国月,2018:44),其书名英译更能反映出原文内容的呈现力度。因此,从书名英译的译者行为切入比较分析,可为中国当代非虚构文学成功译出提供重要的实践参考。

1 中国当代非虚构文学的译出与译入

中国文学走出去存在两种译介路径,一种是“译出”,另一种是“译入”。学界对此多有探讨,如谢天振(2014:7)、唐蕾和俞洪亮(2018:85)、周领顺和任俊(2020)以及陈大亮(2023)等,主要从翻译方向、译者国别和译者母语语种等维度区分二者。李越和王克非(2012:84)定义“译出”为“文学作品的选材、文本翻译、出版均由源语国发起实施,而作品的接受、传播发生于目标语国,是传播的间接方式”,而“译入”为“文学作品的选材、翻译、出版、发行均由目标语国发起实施,接受和传播也在目标语国进行,是传播的直接方式”。这一定义聚焦到赞助人国别,最符合本研究意旨。依此,本文将中国当代非虚构文学英译分为两类——译出与译入,分别收集“熊猫图书”“中国文化译研网”“中译出版社网”“《出版人周刊》翻译数据库”和“‘纸托帮’数据库”相关作品信息,统计时间截至2022年12月30日。通过亚马逊网(Amazon)和好读网(Goodreads)数据查询验证及筛选后,最终得到中国当代非虚构文学作品英译单行本共98部,其中国内出版社英译出版39部,归入“译出”,国外出版社英译出版59部,归入“译入”,如表1(见下页)所示。

众所周知,中国当代非虚构文学的英译出版只表明“走出去”,并不代表“走进去”。是否“走进去”,还要看英语世界的读者是否阅读和评价,即“对译作的出版流通进行系统性的跟进和追踪”(朱振武,2020:85)。中国当代非虚构文学英译不论是译出还是译入,译者首要任务是忠实地向译入语读者传达原文的思想内容甚至语言形式,这是译者职责所在,也是翻译标准使然。“自我期待与他者眼光契合无间,这是最理想的结果,但现实往往比理论复杂得多”(耿强,2012:39),中国当代非虚构文学英译译出作品的接受度远远低于译入

作品(赵国月 等,2024:46)。

表 1 中国当代非虚构文学英译样例

类别	原著	作者	出版社	年代	英译名	译者	出版社	年代	翻译策略	译者行为描述
译出	《湘西散记》	沈从文	译林出版社	2009	<i>Recollections of West Hunan</i>	戴乃迭	CLP	1982	直译	语言性求真
	《中国维和行动》	尚昌仪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2	<i>Chinese Peace-keepers Overseas</i>	姜蓉 等	五洲传播出版社	2015	直译+替换	语言性求真+社会性务实
	《生命的呐喊》	张雅文	新华出版社	2011	<i>Cry for Life</i>	Saul Thompson	China Translation & Publishing House	2016	直译	语言性求真
										
	《苦难与辉煌》	金一南	华艺出版社	2009	<i>Misery and Glory: The Long March and its Antecedents</i>	夏海林 等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2020	直译+添加	语言性求真+社会性务实
译入	《千校六记》	杨绛	三联书店	1981	<i>Six Chapters from My Life "Downunder"</i>	Zhang chu	Westview Press	1986	直译+补充	语言性求真+社会性务实
	《饥饿的女儿》	虹影	四川文艺出版社	1997	<i>Daughter of the River: An Autobiography</i>	Howard Goldblatt	Grove Press	1999	直译+替换+添加	语言性求真+社会性务实
	《黄河边的中国》	曹锦清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4	<i>China Along the Yellow River</i>	Nicky Harman	Routledge Curzon	2005	直译	语言性求真
										
	《露天电影》	苏童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4	<i>Open Air Cinema: Reminiscences and Micro-essays from the author of Raise the Red Lantern</i>	Haiwang Yuan, e tal.	Sinoist	2021	直译+添加	语言性求真+社会性务实

译出作品如“熊猫丛书”之一的《北京人：一百个普通人的自述》(*Chinese Profiles*)，共收集了 100 位生活在北京的各层次公民的自述，虽然这 100 位公民来自全国各地，但北京强大的地域环境与文化对人的塑造不容忽视。如果译者要传达具体的地域信息和文化背景，使用类似 New Yorker(纽约人)的“Beijinger”(北京人)更加准确，但从文化差异的角度来看，西方人更熟悉、更关注“中国人”这个概念，因此译者用“Chinese”更能引起西方人的关注。另一部作品《毛乌素绿色传奇》(*Green Great Wall*)探讨中国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的

关系,塑造了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译者巧妙借用世界八大奇迹之一的长城英文名 Great Wall,并在前面加上修饰词“green”,构成隐喻修辞以传达原文讲述中国的治沙奇迹。不论是用“Chinese”替代“北京人”扩大语义范围,还是用“Great Wall”替代“毛乌素”实现隐喻修辞,译者的处理方式都不是从文本语言层面考虑问题,而是从译入语社会的接受度考虑。书名英译中的这种改写取决于译者的意图,即实现译本的预期传播效果。

然而,意图并不能决定效果。译作 *Chinese Profiles* 截至目前出版已有 37 年,但英语世界的接受效果并不理想,好读网上目前只有 15 位普通读者打分,两条普通读者评论,亚马逊网上只有一位读者评分;《北京人》(1988)的英译修订版 *Chinese Lives: An Oral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China* 情况略好,但亚马逊网上也仅有三条读者评论和 4.8 分的评分,好读网上有 38 个读者 3.95 的评分,五条读者评论,毁誉参半。这些数据还不足以说明《北京人》已走进了英语世界。*Green Great Wall* 在好读网上虽有记录,却无任何读者评分与评论,亚马逊网上更是难觅其踪。再如,译出的作品《与魔鬼博弈:留给未来的思考》,作家雷达(2015)曾评价该作品“涉及人道主义与和平之光,人类战争中的正义与非正义”。中译出版社将其纳入“中国报告”系列,并于 2016 年英译出版,名为 *Playing Chess with the Devil*。加拿大华裔译者黄文胜用语言性求真行为紧扣书名原文,译文完整移植了原文中的隐喻修辞。然而,不论是在亚马逊网还是好读网,都能查阅到该译作,但无任何读者评分与评论。整体而言,译出的中国当代非虚构文学作品并没有达到预期的传播目标。

反观译入作品,评论和评分情况都要比译出作品好。如托尼·布里森(Tony Blishen)英译的《寻访终南隐士》(*A Journey to Inner Peace and Joy: Tracing Contemporary Chinese Hermits*)。英译书名添加了副标题进一步阐释原文书名的语义内容,形式改变了,但整体意义未变。该译作目前在亚马逊网上有 15 位读者给出 4.6 的评分,有五条读者评论,好读网上七位读者给出了 3.71 的评分,有一条读者评论。美国读者 M. King 评论道:“尽管这本书的中文翻译不是很好,但它确实对那些想从禅宗和道教隐士的生活中寻求顿悟的人具有真正的吸引力。”^①类似的还有《冬牧场》(*Winter Pasture: One Woman's Journey with China's Kazakh Herders*),李娟以细致的笔触描写了牧民为了生计在严寒冬季的荒野中的艰辛与努力,呈现了牧民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存智慧。译者沈如风(Jack Hargreaves)与严严(Yan Yan)忠实英译书名,出版不到两年亚马逊网上就有 57 位读者给出 4.3 的评分,有 57 条评论,好读网上有 480 位普通读者给出 3.91 的评分,有 97 条评论^②,并“在英语世界广受好评”(张建平等,2023:108)。美国作家艾莱莎·莱特伯恩(Alesa Lightbourne)在好读网上对 *Winter Pasture* 的评论,字里行间都是褒奖或赞誉:

① https://www.amazon.com/-/zh/gp/customer-reviews/R3LPHEZON1Q9IY/ref=cm_cr_dp_d_rvw_ttl?ie=UTF8&ASIN=1602201501.

② 统计时间为 2024 年 1 月 19 日 17:22。

这本书绝对会让您以新的视角考虑世界上最基本的问题,并钦佩“更简单”文化的韧性。其中,许多见解令人印象深刻。这本书也让我想起了彼得·弗鲁肯的《爱斯基摩人之书》中一个类似的场景,对游牧民族面对生存的坚毅精神有着相同的尊重。(笔者译^①)

译入作品较成功的还有美国汉学家罗鹏(Carlos Rojas)英译的《我的父辈》,2020年格罗夫出版社(Grove Press)出版,其书名被译为*Three Brothers: Memories of My Family*,亚马逊网上有66位读者给出3.6的评分,共19条评论,好读网上有160位读者给出3.54的评分,共29条评论。《出版人周刊》对其评价道:“用直白的散文讲述,这是反映中国过去动荡时期的一部极具感染力的家族回忆录。”^②书评网(Book Reporter)称该译作“是一幅关于悲伤、死亡、家园和命运的哲学画像,闪耀着阎连科的机智和想象力,是一幅动荡时期的个人画像,也是对最艰难的情况下家庭团结力量的赞颂”^③。

2 书名英译的译者行为批评

译者行为横跨翻译活动前后,贯穿始终。中国当代非虚构文学作品书名译出和译入活动中译者行为表现出怎样的规律性特征,两种行为模式有何共性与差异,对当前中国非虚构文学外译有何启发?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思考。译者“不同的身份对其翻译观念和行为的影 响方式亦有所不同”(王晓辉等,2026:62)。本文借助译者行为批评“文本—行为—社会”三位一体的评价系统,目的就是让翻译中“语言的回归语言,社会的回归社会”,然后“将两者有效互动起来”(赵国月,2018:18),以提升研究结果的可信度。“文本—行为—社会”三位一体评价系统由“文本—语言视域”“行为—文本视域”和“行为—社会视域”三大分域构成(周领顺,2022b)。

2.1 文本—语言视域:译出与译入书名英译的忠实度

“文本—语言视域”为传统意义上的文本研究视域,“属于静态研究,各个研究板块相互独立,比如词汇意义、形式意义、词彩浓淡、句子结构复杂度、内涵深浅等,即使译者研究,也多呈现为‘传记式’的研究”(周领顺,2022a:2)。“文本—语言视域”是翻译的基础,依据文本变化描述出翻译活动的基本特征,奠定后两大视域的分析走向。此处以原文意义作为标准衡量译文的忠实度,依据“连续统”理念,用“忠实”“半忠实”和“偏离”三种状态描述译出与译入作品书名英译的忠实度。“忠实”指译文完全保留原文意义,“半忠实”指译文在增加或删除部分内容的基础上保留原文部分意义,“偏离”指译文替换或删除原文全部意义(见表1)。经统计后如表2所示:

① https://www.goodreads.com/book/show/54224001-winter-pasture?from_search=true&from_srp=true&qid=GdiS0CXWCf&rank=1。

② <https://www.publishersweekly.com/9780802148087>。

③ 书评网(<https://www.bookreporter.com/reviews/three-brothers-memories-of-my-family>)是一个在线图书推荐和书评网站,为读者提供各种书籍的推荐和书评,帮助读者更好地选择和阅读图书。

表2 中国当代非虚构文学作品书名英译忠实度^①

类别	忠实(数量/占比)	半忠实(数量/占比)	偏离(数量/占比)
译出	16/41.03%	14/35.90%	9/23.08%
译入	31/58.49%	13/24.53%	9/16.98%

数据显示,虽然两类英译作品的书名都存在忠实、半忠实和偏离三种情况,但译入作品的书名忠实度要高于译出作品的书名。译出作品中,书名忠实英译的如“熊猫丛书”之一《湘西散记》(*Recollections of West Hunan*)、中国画报出版社英译出版的《蓝盔在行动》(*Blue Helmets in Action*),译者在语言意义及形式上都忠实于原文。半忠实的如外文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农民大迁徙:农民工口述实录》(*Behind the Chinese Miracle: Migrant Workers Tell Their Stories*),群体译者李洋等保留了部分内容,又改写部分内容;中译出版社的《中国新生代农民工》,英国汉学家安娜·贝尔(Anna Beare)通过保留、添加等方法将其英译为 *Migrant Workers and the City: Generation Now*。完全偏离原文的有《北京人》,译者抛弃原文书名的意义与形式,改写为 *Chinese Profiles*,扩大了原文书名所指代的人群;澳大利亚汉学家尼尔·托马斯(Neil Thomas)用形容词“green”修饰 Great Wall(长城)替换原文书名《毛乌素绿色传奇》,译为 *Green Great Wall*。

译入作品中,书名完全忠实的有《干校六记》,华裔译者章楚将其译为 *Six Chapters of Life in a Cadre School*,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将其译为 *Six Chapters from My Life “Downunder”*,白杰明(Geremie R. Barme)将其译为 *A Cadre School Life Six Chapters*。虽然这三个译名表达形式各异,但都忠实再现了原文的意义。当然,也有直译再现原文书名形式与意义的《奇来前书》,译者陶忘机(John Balcom)将其译为 *Memories of Mount Qilai*,给读者带来了陌生感。半忠实译名的如虹影的《饥饿的女儿》,葛浩文在保留原文书名形式与意义的基础上,又以副标题的形式补充了著作的文体类别,将其译为 *Daughter of the River: An Autobiography*;此外,张维在自译《中国震撼》时不仅在译名中保留原书名,还增加了副标题,将其译为 *China Wave: Rise of a Civilizational State*。偏离原文的译名有《我与父辈》(*Three Brothers: Memories of My Family*),译者通过替换方式让作品内容前景化,从形式到意义完全改变了原书名。

2.2 行为—文本视域:译出与译入书名英译的译者行为倾向

译者行为研究“以译者为中心,极大增强了评价系统的解释力和普适性,但仍有一定的局限性,特别是涉及超越译者身份及其行为的解释时,仅仅讨论译者的社会性是不够的,译文的社会效果也会出现超越‘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所难以包容和解释的‘超务实’行为结果”(周领顺,2022a:1)。译者行为的倾向可分为三种模式:“语言性求真”

^① 该表剔除了译入作品中未公开出版发行的中文原版及其对应的英译文数据。

(译文从形式到意义都紧扣原文表达)、“社会性务实”(译文在没有改变原文意义的前提下从形式上作出调整以适应译入语语言风格)和“社会化务实”(译文既改变原文的意义,又改变原文的形式)。其中,“语言性求真”与“社会性务实”都属于译者在翻译内的行为倾向,即译内行为,“社会化务实”属于译者在翻译外的行为倾向,即译外行为(赵国月,2022:20;赵国月等,2024:123)。

2.2.1 译者行为描写

“译者被明确为语码转换和意义再现者,兼具社会性的一面。”(周领顺,2022a:6)在传统“文本—语言视域”下对译作的批评中,译者基本上是隐身的,而在“行为—文本视域”和“行为—社会视域”下对译作的批评中,译者就要显身。“文本—行为视域”主要以译者为中心、基于文本语言层面用特定的术语分析译者的行为倾向。

译出作品中,戴乃迭将《湘西散记》译为 *Recollections of West Hunan*,其行为趋向于原文和作者,属于典型的“求真”行为,即译文中既保存了原文书名的意义,也保留了其语言形式。于激均等人也用同样的行为模式将《蓝盔在行动》英译为 *Blue Helmets in Action*,向译入语读者原汁原味地传达原文书名的意义与内涵。当然,“语言性求真”并不能代表译内行为的全部。译者有时候为了加强译文在目的语文化中的接受度,会在不改变原文意义的情况下,从形式上对译入语作出相应的调整,即“社会性务实”。如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的英文版《中国维和行动》(*Chinese Peacekeepers Overseas*),译者将原文中的事件“维和行动”替换为事件执行者“Peacekeepers Overseas”,这样虽然改变了原文部分内容,但整体意义没变化,反而前景化了作品要讴歌的对象,其译者行为模式为“语言性求真+社会性务实”;类似的还有《北京保卫战》(*The Battle of Beijing: On the Frontiers Against SARS*)。

译入作品中,汉学家安德鲁·F.琼斯(Andrew F. Jones)将张爱玲的《流言》英译为 *Written on Water* 则是一种纯粹的社会性务实行为。如果译者只是求取原文的字面意义与形式,完全可以英译为“Gossip”或者“Rumour”,但这不能准确传达作者张爱玲笔下的艰难往事。译者独辟蹊径,在没有改变原文意义的前提下,选择英语中的习语 *Written on Water* 作为英文书名。这一习语在英语语境中暗示“某事不是永久或持久的,微不足道的或容易被遗忘的”,恰好对应了原文书名背后隐藏的作者意图。再如,林丽君和葛浩文(Sylvia Li-Chun Lin & Howard Goldblatt)英译《温故 1942》时,先通过语言性求真行为英译为 *Remembering 1942*,然后遵循英语习惯添加了副标题 *And Other Chinese Stories*。这种社会性务实行为既尊重了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又顺从了译入语社会的诗学传统。

上面列举书名的英译,其译者行为虽然有些务实于社会,但终究没有脱离翻译范畴。务实于社会的译者行为,“要分出内部和外部,即译者身份下的‘务实’和非译者身份下的‘超务实’等等,不能一概而论”(周领顺,2022a:3)。脱离翻译范畴的译外行为带有明显的

社会化特征,表现在文本上就是对原文语言形式与意义的改写,即“社会化务实”。译出作品中,戴乃迭等通过改写将《北京人》英译为 *Chinese Profiles*,抛弃了原文书名的意义与形式,扩大了原文指代的范畴;《毛乌素绿色传奇》(*Green Great Wall*)的书名译文也如此。对于译入作品《夹边沟纪事》(*Woman from Shanghai: Tales of Survival from a Chinese Labor Camp*),译者黄文(Wen Huang)用书中一个小故事的标题作为书名,以“上海”“女人”等关键词抓人眼球。如此种种,书名英译都已脱离翻译范畴。

2.2.2 译者行为倾向差异

本文提取 98 部中国当代非虚构文学作品的书名原文及译文创建小型数据库,以判断书名英译的译者行为倾向(见表 1 和表 3)。

表 3 中国当代非虚构文学书名英译行为模式数据

编号	译者行为模式	译出	占比	译入	占比	译者行为倾向
1	语言性求真	11	28.2%	15	28.3%	译内
2	语言性求真+社会性务实	6	15%	16	30.2%	译内
3	社会性务实	0	0%	3	5.7%	译内
4	社会化务实+语言性求真	13	33.3%	10	18.9%	译外+译内
5	社会性务实+社会化务实	1	3%	1	1.9%	译内+译外
6	社会化务实	8	20.5%	8	15.1%	译外
总数		39	100%	53	100%	6 种

统计分析发现,译出和译入的书名英译译者行为共有如下六种模式:(1)语言性求真;(2)语言性求真+社会性务实;(3)社会性务实;(4)社会化务实+语言性求真;(5)社会性务实+社会化务实;(6)社会化务实。其中,(1)~(3)属于译内行为,(4)和(5)是译内行为与译外行为的相互结合,(6)属于译外行为。整体而言,译者行为有如下特征:一、译出作品中“社会化务实+语言性求真”模式下的译者行为倾向最为明显,占比 33.3%,而译入作品中该译者行为模式占比 18.9%,明显低于译出作品;二、译出作品中“语言性求真”行为模式占比 28.2%,紧随其后为“社会化务实”模式,占比 20.5%,而译入作品中“社会化务实”行为模式占比 15.1%,低于译出作品同模式的译者行为,反而译入作品中“语言性求真”模式下的译者行为倾向较为明显,占比 28.3%;三、译出作品中“语言性求真+社会性务实”的译者行为模式占比为 15%,远远低于译入的 30.2%;四、“社会性务实”模式下的译者行为倾向两者表现都不显著,译出作品为 0,译入为 5.7%;五、译出作品中译者“社会性务实+社会化务实”行为模式占比 3%,略高于译入作品的 1.9%。

上述数据表明,译出作品中“社会化务实”行为模式占有极大的比重,这说明译出作品的译者行为模式倾向于改写原文书名的意义和内容。即便是在“社会化务实+社会性务实”模式下,译者也倾向于改变书名原文部分语言意义和语言形式,而这方面在译入作品中

表现较弱,其“社会化务实”与“社会化务实+社会性务实”两种模式之和仍与译出作品中“社会化务实”单一模式下的译者行为倾向存在差距。不过这两种译者行为模式在整个译入行为中也占有重要比例。译出与译入的译者行为也有较大的共性之处,即两者“语言性求真”模式下的译者行为倾向基本接近,前者占 28.2%,后者占 28.3%。译入作品的译内行为倾向更加明显,因为“语言性求真+社会性务实”模式下的译者行为,译入的倾向要远远高于译出,前者为 30.2%,后者为 15%。

由此可知,译出与译入作品中译者行为表现差异最为突出的是行为取向不同,前者是先“翻译外”后“翻译内”,而后者正好相反,先“翻译内”后“翻译外”。换言之,中国当代非虚构文学英译活动中,译出优先考虑如何改变书名原文意义或形式,再考虑如何再现书名原文意义与形式;译入优先考虑如何再现原文书名,然后考虑改变书名原文意义或形式,甚至在不改变原文意义的前提下,调整语言形式以适应译入语语境。

2.3 行为—社会视域:译者行为的社会效果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中,文本视域发现问题,行为视域描述问题,社会视域解答题。从“行为—社会视域”切入展开批评分析,目的在于“激活围绕‘社会中心’的众多元素,涉及出版、宣传、传播、接受、人群类型、行为、译文等元素和社会呈现的互动关系”(周领顺,2022a:2)。我们从“行为—文本视域”中可以看到,译出与译入的书名的译者行为倾向有共同之处,也存在较大差异,而这些差异或共同之处就是决定作品英译后被读者接受的关键吗?有关研究认为书名译法和读者接受关系紧密,这对中国当代非虚构文学英译也是否如此?

“翻译方法不仅参与翻译生成的各个阶段并在其间发挥作用,而且直接参与了翻译场域内各种关系的建立,包括文本关系、文学关系、文化关系以及更深层次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刘云虹,2023:42)目前来看,不论是主导译出的国内出版社,还是主导译入的国外出版社,都大量征用母语为英语的汉学家译者,译介模式和译者模式也都得到了极大的优化,刘云虹所讨论的上述关系自然都在译者的考虑之中。然而,译出的中国当代非虚构文学的接受效果与预期仍存在较大差距。葛浩文有言:“翻译最重要的任务是挑选,不是翻译。”(曹雪萍等,2008)近期雪漠(中国翻译协会,2024)在访谈中提及各国翻译家为何热衷译介其作品时,认为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内容独特;第二是形式创新;第三是独有的文学精神和文化之光,追求文学除记录和审美之外的“照亮”作用。在谈到当前中国文学海外接受的现状时,雪漠又说:“人类必须有一种共通的东西,互相需要,文明互鉴,成就对方。”^①不论是葛浩文所说的“挑选”,还是雪漠所言的“内容”与“共通的东西”,实质上都是主题。我们从上述数据无法观察到书名英译译者行为倾向与译本接受度存在直接的必然

① <https://mp.weixin.qq.com/s/BlkF5DyRyHO2-k3YxUXNqg>。

联系,但无形中也印证了这种观点。由是观之,决定中国当代非虚构文学是否“走进”英语世界的主要因素是翻译方向和选题。

2010年推出的《中国在梁庄》(简称《梁》)通过人物自述的形式重塑梁庄,以复杂多元的视角描绘数年来村庄内顽强的生命群像,以此透视当代社会变迁中乡村人民的物理形态、情感心理和文化状况,探讨中国当代乡村存在的社会课题。此书于2010年11月获年度“茅台杯”人民文学奖非虚构作品奖,被《亚洲周刊》评为2010年度“非虚构十大好书”,被新浪网评为2010年度“十大好书”,被《新京报》评为2010年度“文学好书”等。2021年6月,英国出版社Verso联合美国汉学家艾米丽·歌德(Emily Goedde)将其英译出版。译者坦言:“13年以前的2008年,我注意到尽管中国有非常丰富的非虚构传统,但是很少有翻译成英语的。这种情况仍然存在,因此这本书的翻译非常重要。”(Lin et al. al., 2022: 109)自《梁》的英译本出版以来,英语国家文学批评家相继对其展开评论,美国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文化学者、文学评论家伊恩·约翰逊(Ian Johnson)对其评论道:“《梁》讲述了一个普遍性的挑战,这些挑战不只是中国的村庄面临的,也是世界各地被疏离的社区所面临的。”^①正因为这种内容的共同性,它才引起了读者的关注,赢得了读者的认可。葛浩文曾这样说:“美国人喜欢唱反调的作品。”(罗屿,2008)这也不尽然,《梁》与《冬牧场》等成功案例说明,凡价值共通且能打动人心的作品都不会受国界的限制,会被读者广为接受。

3 结语

综上所述,英语世界出版社主导的译者英译中国当代非虚构文学作品书名时,优先从翻译内部寻找对策,国内出版社主导的译者则优先从翻译外部寻找对策,使译出的作品书名忠实度要远远低于译入的作品;译入译者行为也更多地倾向于语言性求真和社会性务实,最大程度保证书名原文的意义,译出译者行为则更多地倾向于社会性务实和社会化务实,通过改变书名的原文意义,力求获得目标语读者的接受。事实上译入作品的接受度远远高于译出的作品。我们不敢贸然站在英语读者的角度擅自揣摩书名英译在何种模式下的译者行为更受青睐,也不能断然否定各种模式下译者行为的传播效果,但我们要清楚“市场并不都要由翻译的意义传递是否准确而决定,社会也不会因意思的准确而被接受”(周领顺等,2023)。因此,中国当代非虚构文学作品英译过程中,书名英译忠实与否,译者行为倾向何处,这都不是作品成功走进英语读者世界的决定性因素,真正决定作品是否被接受的核心因素还是翻译方向与主题筛选。“我们可以以传播效果为导向,以语际转换为支撑,以知识传递为重点,寻求跨文化认同。”(张生祥等,2026:122)

众所周知,译者在生产翻译文本的过程中,有创生也有过滤,但更多的时候还是坚守着

^① <https://www.nytimes.com/2021/06/22/books/review/liang-hong-china-in-one-village.html>。

翻译最本质的属性和伦理实施相应的行为,否则翻译就不再是翻译。操控译者行为的因素众多,尤其是在书名的翻译上,出版社在中间的操控力度远大于我们的想象,译者往往会沦为他们的代理人。“因为译者被明确为意志体,而意志体又包括译者及其背后的国家、机构、经营方、利益方等代表的意志,所以‘译者’的范围得到了扩大。”(周领顺,2024:87)译者的行为并不总是单纯的译者自身意志下的行为,或许背后还隐藏着出版商、赞助人或政府的意志性成分。译出的中国非虚构文学作品接受效果差的原因,不能都归结到译者的头上。批评者从书名乃至正文切入的批评,要给译者留有空间和余地,将赞助人纳入批评视野,从社会视域中深度挖掘根本原因。

参考文献:

- 曹雪萍,金煜. 2008. 葛浩文:低调翻译家[N]. 新京报,2008-03-21.
- 陈保红,栗瑞铎,刘璐. 2023. 美国汉学家当代文学译介变迁与中国形象建构探析[J]. 上海翻译(5):89-94.
- 陈大亮. 2023. “译入”与“译出”的名实之辨[J]. 外语教学(2):81-85.
- 陈建平,张保红. 2025. 葛浩文散文翻译的审美忠实——以《干校六记》英译本为例[J]. 外语跨学科研究(2):112-126.
- 耿强. 2012. 自我期待与他者眼光——英译中国文学的阅读与接受[J]. 东方翻译(4):39-44.
- 黄剑. 2021. 再论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书名的翻译——与蒋自强等、罗卫东及谢祖钧先生商榷[J]. 译苑新谭(2):132-142.
- 雷达. 2015. 《与魔鬼博弈——留给未来的思考》:超越国界的正义之光[N]. 人民日报,2015-10-20(24).
- 李越,王克非. 2012. 老舍作品英译中的译出、译入比较[J]. 外国语文(3):83-88.
- 刘云虹. 2023. 中国文学外译研究的问题导向与比较视野[J]. 外语与外语教学(4):40-48+147.
- 罗屿. 2008. 葛浩文:美国人喜欢唱反调的作品[J]. 新世纪周刊(10):120-121.
- 唐蕾,俞洪亮. 2018. 文化无意识与身份建构——基于美籍华裔获得语作家的个案考察[J]. 外语研究(5):85-91.
- 王晓辉,高茜. 2026. 译者行为批评双中心评价系统下的科幻小说英译研究——以《北京折叠》为例[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1):48-66.
- 谢天振. 2014. 中国文学走出去:问题与实质[J]. 中国比较文学(1):1-10.
- 虞建华. 2008. 文学作品标题的翻译:特征与误区[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1):68-74.
- 张建平,刘慧敏. 2023. 典雅精当,铢两悉称:《冬牧场》英译本的生态人文景观再现[J]. 中国翻译(3):108-115.
- 张生祥,张俊乐. 2026. 论翻译传播研究的三个取向:以《论持久战》为中心的考察[J]. 中外交流研究(中英文)(2):113-123.
- 赵国月. 2018. 美国非虚构文学在中国的译介研究——以“国家图书奖”和“普利策文学奖”作品译介为例[J]. 中国翻译(3):44-52.
- 赵国月. 2018. “译者行为批评”几组概念正解——与宋以丰先生商榷[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4):13-23.
- 赵国月. 2022. “角色转移”下的译者社会化行为——基于三个《西行漫记》汉译本的考察[J]. 翻译季刊(4):19-29.
- 赵国月,高晓仙. 2024. 抗战背景下《西行漫记》译者社会化行为探析[J]. 外国语文(1):122-130.
- 赵国月,祝朝伟. 2024. 中国当代非虚构文学英语译介:问题与对策[J]. 中国翻译(5):46-52+192.
- 郑晔. 2021. 国家译介行为论:英文版《中国文学》的翻译、出版与接受[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 中国翻译协会. 2024. 雪漠. “翻译中国·拥抱世界”访谈活动第四期——“中国文学作品翻译与海外传播”成功举办[EB/OL]. (2024-03-19)[2024-03-08]. <https://mp.weixin.qq.com/s/BlkF5DyRyH02-k3YxUXNqg>.
- 周领顺,任俊. 2020. 译出态度与译者行为——以本土译者汉语乡土语言译出实践为例[J]. 山东外语教学(4):102-109.
- 周领顺. 2022a. 译者行为批评“行为—社会视域”评价系统[J]. 上海翻译(5):1-7.
- 周领顺. 2022b. 译者行为批评是翻译批评的关键路径[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12-13(8).
- 周领顺. 2023. 讲好中国文学故事过程中的互动关系:“文本—行为—社会”三位一体分析框架[EB/OL]. (2023-12-12)[2015-12-15]. <https://www.dlnu.edu.cn/foreign2/xwzx/xyxw/117536.htm>.
- 周领顺. 2024.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及其应用问题——答研究者(之三)[J]. 外国语文(1):84-96.
- 周领顺,田海龙,任东升,闫怡恂,王峰,赵国月,彭白羽,杨彬. 2023. 译者行为研究新发展对话[J]. 语言教育(3):3-18.
- 朱振武. 2020. 汉学家中国当代文学英译研究存在问题及应对策略[J]. 外语教学(5):81-87.
- Lin Shiqi, Liang Hong, Emily Goedde et al. 2022. China in One Village[J]. *Chinese Literature and Thought Today* (53):1-2, 107-116.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Translator Behavior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itl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Nonfiction Literature

GAO Xiaoxian ZHAO Guoyue

Abstract: The recep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non-fiction literature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is not ideal, especially for works translated under the auspices of domestic publishers, which often fail to achieve satisfactory dissemination. Translations of titles into English, led by publishers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prioritize methods found within the translation itself, while translations led by domestic publishers, prioritize methods found outside the translation. Consequently, the fidelity of in-bound translated book titles into English is higher than that of out-bound translated titles into English. Translators of works in-bound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prefer truth-seeking and social-utility at the linguistic level first, whereas translators of works out-bound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prioritize social-utility and socialized-utility. However, the acceptance of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non-fiction literature suggests that the fidelity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book titles is not the key factor; rather, the direction of translation and the subject matter are the decisive factors. Therefore, to effectively make translated contemporary Chinese non-fiction literature accepted by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and construct an expected image of China for the target readers, it is necessary to learn from the subject selection and translator behavioral patterns of works that have been successfully translated into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Key words: contemporary Chinese non-fiction literature; book title; translator behavior; out-bound translated; in-bound translated

责任编辑:蒋勇军